

〔俄〕阿·恩·丘马科夫 著
姚洪芳 哈思宸 译 安启念 校

全球性

问题

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 913
13

95467

14178/26
全球性问题哲学

〔俄〕阿·恩·丘马科夫 著

姚洪芳 毋思宸 译

安启念 校



20012727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性问题哲学 / (俄) 丘马科夫 (Чумаков, А. Н.) 著; 姚洪芳, 毋思宸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ISBN 7-300-02204-9/B · 237

I . 全…

I . ①丘… ②姚… ③毋…

II . 全球学-哲学理论-研究

IV . 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2410 号

全球性问题哲学

〔俄〕阿·恩·丘马科夫 著

姚洪芳 毋思宸 译

安启念 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5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8 000 册数: 1-2 000

定价: 6.00 元

А. Н. ЧУМАКОВ
ФИЛОСОФИЯ
ГЛОБ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 1994

本书根据莫斯科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译出

译 者 的 话

本书由莫斯科知识出版社 1994 年出版。作者阿·恩·丘马科夫是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导研究员、俄罗斯哲学学会第一副主席。丘马科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副博士和博士学位，其副博士和博士论文均与全球性问题有关，现已成为俄罗斯哲学界关于全球性问题的专家，有多种著述问世。全球性问题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由“罗马俱乐部”最早提出并研究的一些关乎全人类、涉及全球范围的问题，在今天的世界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俄罗斯哲学界自 70 年代初开始研究这一问题，至今热情不减，而且对许多有关问题提出了与西方学术界明显有别的观点，为世界所重视，也是前苏联和今日俄罗斯哲学界最引以为自豪的研究领域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作者的有些看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望读者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鉴别。我们之所以要翻译出版这部著作，是因为本书从哲学的高度对全球性问题的形成、发展、理论、系统和意义做了较好的论述，对前苏联和俄罗斯哲学界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做了全面系统的概括，这些对于我国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了解和认识全球性问题，大有裨益。本书由姚洪芳、毋思宸译，安启念校。王丽云副编审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对译稿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深表感激。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1995 年 12 月 2 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全球性问题的历史发展.....	(4)
一、世界性问题的产生前提.....	(4)
二、社会和自然：它们的相互作用.....	(9)
三、现代文明最重要的问题	(15)
四、军事威胁与拯救人类	(28)
五、对全球性趋势的认识	(37)
第二章 全球性问题理论的形成	(41)
一、未来及预见未来的可能性	(41)
二、对科技进步的认识过程	(44)
三、全球性模拟的产生与发展	(49)
四、作为科学方向的全球学	(64)
五、西方全球学发展的基本趋向	(67)
六、“社会主义国家”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	(72)
第三章 作为哲学分析对象的全球性问题系统	(79)
一、从单个问题到它们的系统	(79)
二、全球性过程的研究方法	(82)
三、哲学知识和局部科学知识的相互联系	(85)
四、哲学在解决世界性问题时的作用	(89)
五、全球性问题：它的实质与标准	(95)
六、全球性问题分类中的迫切问题.....	(104)
第四章 全球性问题与新人道主义哲学.....	(113)

一、作为全球意识形成因素的全人类问题.....	(113)
二、处在变化着的世界中的人：思维形式的改变与更 新中的人道主义.....	(116)
三、当代世界性趋向背景下的社会积极性.....	(127)
代结束语.....	(134)

前　　言

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人类进入了一个由各种极为复杂的依赖关系和普遍性问题构成的世界，这些问题已经使人类失去了以往那种对自己的永恒存在的自信。在此之前，我们这颗星球从未遭受过今天这样的沉重压力，而人类还从未与自己的劳动成果处于如此的矛盾之中，这些成果使他极端地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成就，使他在自己所创造的强大力量面前得不到必要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人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准备不足，首先是在意识上感到突然。

人类对于所出现的各种矛盾的理解几乎要赶不上这些矛盾增加和尖锐化的速度。在理解过程中，人们逐渐地但也是越来越明确地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即这些全球性问题在其表现规模和危险程度上对人而言是史无前例的，而可以用于克服它们的时间正在越来越少。许多全球性问题，如军备竞赛、环境污染、能源及某些其他原料的缺乏、新疾病的出现，正以其严重的后果现实地威胁着整个人类。

虽然全世界都正在积极寻找克服全球性问题的途径，但这些问题给人和环境造成的危险，仍在继续增长。同时，迄今还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可以付诸实施的解决办法，还没有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极端需要的共同行动。各种努力，有时还是由个别的或某些国家所做的重大努力，并不总能获得预期的结果，至多只是使那些成为人类共同灾难的问题得到缓和，而不是真正解决。造成这种局面的基本原因，在于这些问题所表现出的全球性和对它们

的解决方法的局部性之间存在着矛盾。

同时，关于种种全人类问题的认识明显地扩展了，也更深入了。它们的实质与根源已经得到说明，与此相关，不仅各种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的深刻联系得到揭示，而且全球性问题自身的深刻联系也得到揭示，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它们与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及科学技术的内在依赖关系。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已经明白，人在很大程度上，在较以往所认识到的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和周围环境。整个世界处于相互联系之中，这已显而易见。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在不断增长，已经成为直接影响整个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有原因的，这就是近 20 年来在积极的科学探索中人们做了无数的研究工作，就各种全球性问题及它们综合而成的整体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全球性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它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技术及经济等方面成为哲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专门分析的对象。其结果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知识领域——全球学，已经有必要对它是什么、处境如何、它已经解决和将要解决哪些任务等问题加以明确的规定。这一领域近 20 年的研究为进行上述概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今天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出版物，它们通常是对某一个或几个全球性问题的某些方面的揭示。但是，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其他国家，把全球性问题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门全球学，作为一种旨在使面临严重危险的人们从理论上得到武装的跨学科知识加以研究的著作，还不多见。

因此，各门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今天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以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与自然的谐调关系的现代观念为基础，形成新的全球性思维。现在，各类学校的教学大纲中都积极引入了有关各个全球性问题及其诸方面的课程，这更使人感到关于全球性问题的专门著作的缺乏。

本书将力图填补上述空白并帮助感兴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著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艾鲁尔金说：“90年代将是不同寻常的时期，大家应对此有准备。你们正处在文明发展史中最困难但也是最惊人的10年的开始。”^① 应当说这话没有说错。

^① Д. 奈斯比特、П. 艾鲁尔金：《90年代等待我们的是什么》，莫斯科1992年版，第357页。

第一章 全球性问题的历史发展

一、世界性问题的产生前提

到本世纪末，人类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它遇到一些极为复杂的以往所不知道的问题。乍看起来，这些问题 是崭新的，是突然产生的，但实际上它们有着漫长的历史和复杂的形成道路。它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那时，原始人还在与可怕的自然力量进行顽强的斗争，以捍卫自己最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存权和保障最基本需要的权利。水灾、火灾、干旱、严寒、飓风、地震，威胁着人的生存，迫使人们想方设法与冷酷无情的自然力相对抗。人并非总能逃避危险和保护自己，由此便产生恐惧和丧失信心，感到自己只能由威力无边的自然界所摆布。这种心情缠绕人类数千年之久，在众多的神话、故事、传说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而这些神话、故事和传说代代相传，直至今日。不同大陆各民族的文化遗产，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例如，阿兹台克人的神话认为有五个纪元，每一个都以灾难而终结。第一个纪元中生存一些巨人，毁于洪水；第二个纪元由大地支配，毁于地震，人则变为猿猴；第三个纪元由风支配，毁于飓风；现在的，也即第四个纪元，由火支配，正在等待着一场横扫一切的大火；按照这一传说，第五个纪元终将为彻底的灾难所毁，这意味着大地和太阳都将不复存在。

不少古代文献资料指出，一些曾现实存在过的文明由于纯粹的生态原因而导致灭亡，其中苏麦尔人的文明就是因公元前 3000

年末的一场严重的旱灾而消失的。人们认为，从前曾一度繁荣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众多的盆地之所以变成沙漠，原因在于不正确的灌溉造成土壤的侵蚀和盐碱化。

近来，关于恐龙灭亡原因的一个假说成为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一些研究以巨大数量存在于地球某些区域的小玻璃珠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些小玻璃珠是流星进入大气时的熔炼物。由此得出了大约 6 500 万年之前地球曾和一颗直径达数公里的巨大流星相撞的结论。按照这些人的意见，这次碰撞引起一系列大火，浓烟笼罩地球，导致了严寒和生活于当时的恐龙的灭亡。

许多宗教故事，例如圣经中关于世界性大洪水的传说，或者是预言了世界末日的启示录，讲述了无数的被称为人类世界性灾难的重大苦难，讲述了人对他所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普遍依赖。反映对世界及人类命运的消极观点的类似说法，不仅出现于基督教领域，而且出现于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之中，并在出现重大的社会政治危机、动荡时，往往得到广泛的传播。每当这种时候，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彼岸力量的观念总要盛极一时，而对人来说，他的未来通常被和世界末日的到来以及最后的审判联系在一起。

1812 年，法国学者居维叶在解释从不同地层中发现的各种动植物化石时，以自然科学证明取代了宗教解释。他提出了“灾变说”，认为在地球上周期性地重复着突然发生的岩石移动，这些移动改变地貌并使一切物种灭绝。这些思想未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因为关于地球及其历史、结构的科学知识以其迅速发展在 19 世纪末便使灾变说失去了吸引力。

人的理解各种紧迫问题并预见自己的未来的企图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联系在一起。这些乌托邦表达了以公正原则改造社会的人的永恒的愿望，而这种社会性的公正，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

这类乌托邦思想早在古代便得到传播（如柏拉图的乌托邦），但对它们的发展的主要刺激，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下。后来，直到 20 世纪为止，乌托邦思想由记述完善的国家和在理论上解决社会理想问题的愿望变为在实践中实现欧文、傅立叶、卡贝等伟大空想主义者的思想的企图。在各种各样的方案中，不少的注意力被用来讨论战争与和平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问题。在这里，只要提到下面这些名著就够了，它们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洲》、马林诺夫斯基的《论和平与战争》，等等。

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及追随这场革命而发生的种种事件之后，出现了一种反乌托邦主义的理论，其作者视这场革命为乌托邦思想的实际体现。反乌托邦主义的出现是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及随后各种事件的反动，宣传这种思想的作者们试图就种种现实的而不是想象的危险向人们发出警告，他们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关心。按他们的看法，人类的未来可能由于实行未经深思熟虑的社会实验和对社会的强行改造而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他们发表了不少反对“被合理化了的技术文明”的意见，这些意见已经对人及其环境所面临的威胁做了考察。

但是，无论是成为 20 世纪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还是与之密切相关的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造，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成为以往的另外两种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逻辑继续。

事实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人开始有可能不仅保证自己的基本需要而且生产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这种交换给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以有力的刺激。同时，得到增长的商品交换扩大了贸易并因此扩大了各文化发源地的界线，使之在越来越多的新的领土上得到传播，使各种各样的民族步入文明并使它们不断地为下次革命——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出准备。在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之前，这一过程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此外，由农业经济向工

业经济的转变虽然已进行了 200 多年，但对不少国家而言这一转变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和农业革命一样，工业革命同样与深刻的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标志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

在这一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开始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发展，工业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显著增加。医学上的某些成就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保证了人口的急剧增加。这些趋势使得 18 世纪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杜尔哥提出“土地承受能力递减规律”。稍后于他，英国经济学家、牧师马尔萨斯发展了他的思想，提出了日后广为流传的著名观点，按照这一观点，存在着由食品数量决定的调节人口数量的“自然规律”。地球上的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而人赖以生存的资源则以算术级数增加，这势必导致“绝对的人口过剩”，并造成威胁人类的众多灾难。如果抛弃马尔萨斯由此得出的种种不人道的结论（通过饥饿、战争、瘟疫等途径对人口数量实行“自然控制”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那么他的思想并非毫无道理。这一理论日后出现了许多追随者，形成了马尔萨斯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等流派，这说明马尔萨斯所提出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只是在发生重大灾害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才放慢速度，在一个短时间内人口还会减少，例如在 14 世纪的欧洲，由于鼠疫流行，死了 1 500 万人，也即近于总人口的 $1/4$ 。在 19 世纪，印度和中国因饥荒而损失人口约 5 000 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班牙感冒”的流行夺去了欧洲近 2 000 万的人口，这也不能不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在其他的历史时期，地球上的人口从古到今一直在不断增长，而在近 200 年增长速度尤高，直至从本世纪中叶起形成“人口爆炸”。大约 1 万年以前，人口增长的速度只有每千年 10—20%。新石器时期开始时（公元前 7000 年），地球上已有约 1 000 万人，这时，畜牧业和农业的出现保证了剩余食品的稳定生产，因此减少了饥饿造成的人口损失，使人口数量得以增加，

至公元前5世纪已达到3 000万人。公元初年，地球上2 000—2 500万人。要使这一数量的人口翻番，当时需要1 300年，然而人口的再次翻番只经历了600年。到19世纪初为止，地球上总共有8亿人，90年以后又增加了8亿，到1962年，也即仅仅又过了72年，地球上的居民已有32亿之多。目前，地球上已有50亿以上的人口，根据专家的意见，到下个世纪开始时，还将增加10亿。

人口增长速度的加快，不仅是社会生活各领域（经济、健康保护、农业等等）加速发展的结果，而且也同时成为其他如粮食、生态、能源、原料等问题激化乃至产生的原因，造成了一系列与都市化、交通、娱乐等联系在一起的前所未有的负面现象。在这里，科学进步的结果与速度是唯一的原因。

在工业革命酝酿和展开的历史时期，也即在近300—400年，作为统一整体的人类，作为居住在地球这颗星球上的“同胞”的人类加速形成。在这一相对而言比较短暂的历史时期，人们获得了关于地理和地球结构、关于地球在宇宙空间中的位置、居住在地球上的各个民族、地球上动植物种群的多种多样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极为丰富的、正确的认识。这使他们不得不重新看待世界，不得不重新理解地球生命的独一无二性，并以新的眼光考察人在这个不可重复的地球王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必要性的存在不仅是因为人除了关心自己的命运之外还对全部地球生命的命运负有责任，而且也因为人的行为、观念及思维方式现在应当适应他周围世界中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发生的变化和改变。

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人自身，在于因科技领域层出不穷的新成就而得到多方强化的人的有目的的改造活动。在科学技术革命急剧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几十年内发生的变化比整个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代发生的变化还要多。同时，上述革命中的每一次革命不仅在历史上出现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且每次都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的更深刻、更重大的变革。如果说从

口头交往到文字产生人类经过了近 300 万年，从文字产生到印刷术出现用了大约 5 000 年，从印刷术到电话、无线电、电视、录音机等视听技术用了大约 500 年，那么从传统的视听手段到现代计算机的问世用了还不到 50 年的时间。20 世纪后半叶，各种发明从出现到在实践中使用所需要的时间更短，它们往往不是用年而是用月来计算。

上述加速发展的趋势出现于 19 世纪初。在此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仅最重大的、极端重要的发现和发明就有 500 多项。例如，从 19 世纪上半叶开始出现了轮船、火车以及运用蒸汽作为动力的许多其他机器，出现了种种传染病的预防接种、人工呼吸机、碘酒、吗啡、水泥、铝、电报、照像纸、早期的电灯、火柴以及许多其他东西。

如果说在 18 世纪中期各个民族在生活中还很少往来，他们的相互联系还不引人注意，那么 19 世纪的到来使这种情况得到极大的改变。技术、经济以及陆上和海上的交通极大地增加了人的改造能力，增加了人的机动性。世界性贸易的发展及世界经济各领域、各方面的相互依赖的增加，便是很自然的事。20 世纪初，航空技术问世并得到迅速发展，随后出现的宇航技术更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过程。其结果是，地球上不仅不再有什么“空白点”，也即尚未被人触动过的土地，实际上，不论是地球表面还是在海洋、大气及地层等空间，“净土”已不复存在。这种情况使得人们把地球的生物圈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考察，而所有的人都面临的那些共同的问题，则成为全球性问题。

二、社会和自然：它们的相互作用

解决某些全球性问题的最初尝试，已经揭示了全球性问题整个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极为丰富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多

数全球性问题都和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如果说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是诸如饥饿、疾病、人口的过度增长等问题的主要原因，那么发达世界则对其他的许多危险，如核战争的威胁、生态危机、能源和原料资源的日趋枯竭等，负有主要责任。

近 100 年来人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和发展速度，使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成为头等重要的问题，社会生活所有其他领域中矛盾的迅速激化就直接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对于导致各种全球性问题产生并随后日趋尖锐的种种条件与原因的揭示，最好是从考察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开始。这种考察对于理解全球性问题的实质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还因为正是在这里，在某些局部的，然后是某些地区的人与环境的冲突中，暴露出了具有全球规模的各种事务的某些不良征兆。

生态问题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势所难免，它存在于人类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由于这一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断加强，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形式。人类最早的先民从事狩猎、渔业、采集等活动，以占有现成的物品来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也即以周围所生长、奔跑、爬行、飞翔、游动的适于充饥的东西来使自己得到满足。那个时候，人似乎完全融于自然之中，没有把自己和自然界对立起来，因而也没有给环境造成明显的损害。

后来，随着在物质财富的获取方式上由采集向生产的过渡，人越来越把自然界及其资源纳入自己的经济循环之中，显著地改变着自己的居住环境。于是，森林在燃烧并被连根拔除，以开垦耕地；运河和灌溉系统在不断修建；各种有用的矿产，首先使人的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的金属矿产，被有目的地加以开采。同时，劳动工具不断完善，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工程设施和灌溉设施。人日益由与自然界等同的动物变为与之相区别的存在。自然界开始